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沿着塞纳河

如果是静静地生活，细细地体会，我可能会喜欢巴黎的。

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尔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后来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出名的历史悠久的美术用品店里买到一具理想的三脚凳，画画的时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着了。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到的那个巴黎和我那么遥远。他们的“评议”，只给我一种站在大深井边的神秘的惊讶。六十多年前，我毕竟太小，对自己身边的现实尚茫然不得而知；几万里之外的巴黎和我有什么相干？

徐志摩写过英国、意大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在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中的徐志摩。让五六十年前的读者眼睁睁地倾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大少爷宣述典雅的感受。

我倒是从雨果和左拉、巴比塞以及以后的爱伦堡、阿拉贡这些人的文字里认识到巴黎真实的人的生活，那种诗意的广阔，爱情和艰辛。

50年代初期，香港放映了一部美国歌舞片叫做《巴黎艳影》。为什么40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庸俗的名字呢？平心而论，它是一部活泼生动的片子，介绍几位住在阁楼的年轻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真实的生活方式。导演一流，舞蹈一流，摄影一流，演技一流。其中采用了后期印象派矮子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画作中的人物和色彩，让那些在灯光下的红色、绿色的脸孔闪耀起来。

伟大的电影家、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老朋友伊文斯拍摄过的纪录片《雨》、《塞纳河畔》，精心地给人们一层一层剔开巴黎和巴黎人的原汤原汁的那种心灵中最纯净的美。

我是个“耳顺”的老头子；其实一个人到了“耳顺”的年纪，眼应该也很顺了。

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

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麦人、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视线，但一经发觉，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但这些美国人、德国人不会。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习惯了，“眼顺”了，我放下画笔休息，喝水抽烟，站起来东看西看，舒展心胸。

巴黎人、意大利人历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

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提到巴黎人几十年前一段趣事：一个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头咖啡馆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来人往，不以为意。警察走过来了，他也不理。警察问他：“先生！你不冷吗？”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着离开。

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来看去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

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的游客，大多麇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铁塔周围，形成 20 世纪的盛景。

有文化教养，有品味的异国人大多是不着痕迹地夹在巴黎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懂得巴黎真正的浓郁。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通。

“蒙娜丽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个搞美术的香港人对朋友们说。我也在场。

蒙娜丽莎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

巴黎是画家的摇篮、天堂。

巴黎又何尝不是画家精神的、肉体的公墓。

像战争中的将军一样，将军是成功的士兵。真正在战场上厮杀的千百万战士，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中国一位非常聪明的画家住在巴黎，名叫常玉。50 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艺术团来到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勉强地维持着生活。他不认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运行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代表团中一位画家对他说，欢迎他回去，仍然做他当年杭州美专的教授……

“……我……我早上起不来，我起床很晚，我……。做不了早操……”

“早操？不一定都要做早操嘛！你可以不做早操，年纪大，没人强迫你的……”

“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大家都要做的……”

和他辩论是没有用的。各人有各人心中的病根子。虽然旁边的人看起来是一件区区小事。

早操做不做概由己便，这是真的。如果常玉知道开会是非去不可，那理由就驳不倒了。常玉不知道开会是一种比早操可怕得多的东西，尤其是搞起运动来的时候。

60 年代常玉死在巴黎自己的阁楼上。《世说新语》的一段故事中有句话说得好：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就是常玉。

对于人来说，巴黎太好玩；对于画家来说，巴黎是艺术庙堂的极峰。

十多年前，儿子在选择去巴黎或罗马哪个地方学画举棋不定的时候，我让他去了罗马。理由仍然是巴黎太好玩，年轻人在那里容易花心。

有一天，斯诺夫人和阿瑟·米勒的夫人英格尔在北京我家吃饭，谈到我儿子选择罗马读书的决定时，她们大笑地告诉我：“罗马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啊！……”

儿子到底还是去了罗马。

我从历史的角度发现，巴黎和意大利诸城的艺术环境很像一个装蜜糖的大缸。收藏之丰富，艺术之浓稠，原是千百万蜜蜂自己酿出来的。但人们却常在大缸子里发现被自己的蜜糖淹死的上百只蜜蜂。

一般的观众和爱好者欣赏名作时，是无须担心给“淹死”的。从事艺术者却不然。他每天和艺术的实际性东西接近。年深月久，欣赏水平远远把自己的艺术实践水平抛在百里之后。眼光高了，先是看不起同辈的作品，评头品足；最后连自己的劳作也轻蔑起来，干脆什么也不做，粘住手脚，掉进缸里淹死完事。

艺术的蜜罐里，不知淹死过多少创造者。

蜜蜂原是在花间、在蜂房里工作的成员，固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到蜂蜜缸边走走，欣赏历来劳动的成果，壮壮自己的声势；然而站在缸边活动的工作终究不是分内的事。艺术工作之可贵原就在一口一口地酿出蜜来，忘了这一口一口，忘了那来回奔忙的任务，已经不像是一只正常的蜜蜂了。

我有时还自觉不太像一只蜜蜂。虽然，不怕晒太阳，不怕走远路，经得起一坐七八个小时，忍得饥饿、干渴，虽然后腿窝囊里的花粉——自己食用的粗粮采得满满的；至于高质量的蜜糖，却未必一定够格。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和历代高手以及当代能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思想。

走在塞纳河边，背着沉重的画具，一边走一边嘲笑自己，甚至更像一只蚂蚁。

不过蚂蚁比我好，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都比我强。

我是一只孤独的蚂蚁。世界上有独居的蚂蚁吗？请问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印象派是沿着塞纳河发展起来的？

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分贫富，都沿着塞纳河居住，画的都是塞纳河一带的生活，除了高更远远地在塔希提岛之外——虽然塞纳河还是他的老根。

这是一个颇为有趣而特殊的现象。

我想告诉一位在巴黎居住而研究美术史的女孩，问她为什么不去写一部这样的又厚又大、夹着精美的照片和插图的大画册呢？我真想这么写信给她：

“比如说，沿着塞纳河，也沿着印象派的发展史；沿着每一位画家的生活；沿着他们曾经画过的每一幅作品……你开一部小小的汽艇，装满你需要的美术研究资料、摄影器材。花一段较长的时间生活在你的小世界里，我想你会做出跟任何过去的美术史家不相同的成绩来。同时也很有趣，你想，太有趣了是不是？你还可以钓鱼，高兴就跳进水里。做一个船上的美术史家。”

世界上许多文化成绩都是由一些乌七八糟的怪念头点燃的。接着我还想这么写：

“身边的巴黎不写，你到翡冷翠来研究拜占庭干什么呢？或者，你是来学习‘研究方法和技巧’之后再去研究巴黎文化的罢！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个谜。巴黎、塞纳河、印象派和你这一类的女孩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任何人都要去研究一种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文化？

“我这个老头丝毫没有有任何系统的文化知识，却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我要这些知识干什么？极系统、极饱和的庞大的知识积聚在一个人身上，就好像用一两千万买了一只手表。主要是看时间，两三百元或七八十元的电子表已经够准确了。不！意思好像不是在时间之上。于是，一两千万的手表每天跟主人在一起，只是偶然博他一瞥。

“读那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这就太浪费了！”

“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认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这书有什么意思？比如，苏联几十年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事关紧要的最有益的书；怀疑是有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照国际共产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林彪的《毛主席语录》也有同样的效能。这都是时间转移的结果，由不得谁和谁来决定。

“我怎么越说越远了？

“关于塞纳河和印象派的关系，相类似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想一个人找一只木船，带着摄影、录音器材和画具，从我的老家洞庭湖出发，上溯沅水或是泔水，沿着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或是四五十年前的沈从文的文章中提到的事物做一些考据和调查，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访问，体会。浮过一道道长满幽兰和芷草的清清的河面，真是令人神往。我可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了。家乡的河流失了我；我也失掉了家乡的河。

“你呢？你没有失落掉塞纳河呀！塞纳河随时都等着你。唉！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虽然有条理，耐烦，负责任，意志坚强，也雅兴不浅，只是个子太小、太稚弱。

“你受得了书房之外的劳动吗？这种工作想起来满是快乐，陷入之后心情的焦躁，孤独，有时忽然觉得枯燥，或者和所有的女孩子都具有的美德——嘴馋一样，突然怀念起某种时常吃到的零食，而小船上恰好离卖这种‘恩物’的商店很远……这一切，你抵抗得了吗？

“当然，当然，你还可以，而且应该到翡冷翠来研究你的拜占庭艺术，不过，不要忘记一个老头说的这个值得一试的工作。”

梵高的故乡

“屋外走蛙式”。

多么古怪的一个名字。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中国字来顶替它的音译。

这是一个小镇，离巴黎两三个钟头的汽车路程。因为梵高在那里生活和逝世而得名。那些教堂、市政厅、故居，以及田野山丘还原封不动，引来许多包括我在内的好事之徒的访问。

梵高与跟他相依为命的弟弟的墓葬都在山丘上的坟场内。两兄弟墓碑并排，让一些翠绿的蔓草连在一起。是梵高为其画过肖像的医生——嘉塞先生（Dr. Gachet）替两兄弟办的后事，是位真诚的有心人。

梵高的弟弟好像是为了照顾可怜的哥哥才来到这个世上似的；梵高一死，弟弟第二年也跟着离开人间。

梵高一生只卖过一幅画，是弟弟安慰哥哥而设计的善心的圈套。

梵高在热闹的人间那么孤寂，逝世百年之后，人们残酷地拍卖他的画作，画价高如天文数字，足够买得下当年一万个活梵高。

“屋外走蛙式”镇子不大，寥落散漫，也不好看。由市政厅小方场自转一周，即能找到梵高画过的好几幅画。连摆木床和椅子的房子在内。

他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巴黎太远，他只好画四周的风景，画遍了每一个角落。现在，每一个角落都打着梵高的旗号在做生意——梵高画店、梵高咖啡店、梵高饭馆、梵高旅店、梵高百货店、梵高画廊、梵高汽车服务。

梵高短短的十年美术生涯，一个没习过基本功的人，初出茅庐就打算靠画画吃饭，未免太自信了。他就是依靠这点自信活了下来。同时还接济着一位带着几个孩子的寡妇。及至他逝世之后，这区区自信给我们居住的小小寰球来了一次很艺术的地震。人们膛目结舌几年也难得复原。

一个人出了名，到处都有人跟他认同乡。梵高是荷兰人，生前住在这里是因为房钱便宜。那时，有谁会理会这个长满红胡子的怪脾气的荷兰人呢？

肯定梵高的画也算是一种画，而且是好画，既要有远见，还要有特别的勇气。

世上所有的大桥小桥都是难忘的。

当人不高兴、忧伤的时候，你问他，你喜欢桥吗？你一生走过多少好看的桥？他情绪会舒展开来……

桥跟人的微妙的情绪末梢联在一起，个人的玄想，爱情的始末，甚至绝望，如果有一座桥就好了。桥时常跟人商量事情，帮你做一些决定……

“我看你就嫁给他吧！你看天气这么好！”

“走！远远地走！……”

当然也会发生不幸的结局——

“既然这样，活着没意思，勇敢点！从我这儿跳下去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桥。桥不断创造美丽的回忆。

巴黎桥上没有相同的灯。

桥是巴黎的发簪。

俄国沙皇要来巴黎作客，法国皇帝便造了一座辉煌华丽的桥来欢迎他。造桥成为一种炫耀的方式。

有一幅宋人画的题目起的实在好：《长桥卧波》。

桥卧在波浪上面，人在桥上岂不很妙？桥的确令人油然而生卧波的心旷神怡。

神怡之感。

人问孩子：鼻子干什么用？

回答是：产鼻屎的；

又问：脑袋有什么用？

回答是：长头发的；

又问：腿有什么用？

回答是：穿裤子用；

最后问：桥有什么用？

回答是：过船用。

只有桥的回答具有超脱了实用主义的诗意。船从桥下穿过，曾给回忆中的孩提时代带来多少欢欣！

朱雀桥、灞桥、午桥、天津桥……古人也是喜欢在桥上做些动作的。

“谁在天津桥上？杜鹃声里阑干。”桥的景致真是千变万化。

罗丹是一个人的名字，又标志一个时代的开始。

他不像米开朗琪罗有空还写写诗。他从心底到身历都很忙，没时间去弄文字这类的事。所谓的“罗丹艺术论”，是学生记录的笔记汇编。罗丹这个人妙语珠玑，思路淋漓，记下来就成文章。

对于罗丹的创作，时时出现有趣的怀疑和争论。那个站着伸腰的男子像，原是他战壕中的难友。有一天在街头遇上了，罗丹邀他来画室做的这个雕塑作品，却被人认为是用活人翻制出来的工艺。一些美丽而微带朦胧的女大理石雕像，人们说是用泥浆淋在泥雕塑上再用大理石仿刻的。

人们对于陌生的现象往往反应出自我见闻的十分局限。

几十年前，我家乡一些人对所有的科学和机械产品都采用非常简单的结论，要不是有“药水”，就是有“发条”。

对待罗丹也是如此。他太权威，这是早就形成的，因此不需在名分和实力上跟人拼搏厮杀。不是忍让，是不屑一顾。

他用十年时间做成了巴尔扎克像。这当然是划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大作。但人们不理解，不接受；连某些高明的鉴赏家也不接受。罗丹毫不惊慌愤怒。美国 and 别的国家乘虚而入的艺术掮客和收藏家要收购这件作品，罗丹也不理会，只退回了法国文学家协会的订金。风度真好！可恶的文学家协会竟然登报声明，不承认罗丹的巴尔扎克像是巴尔扎克像。

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不承认罗丹的作品，罗丹的作品就不存在了吗？于是文学家协会进一步邀请了蹩脚的雕塑家华尔切来承担重新雕塑巴尔扎克，华尔切偷窃罗丹将巴尔扎克穿晨衣的构思，做出一件被人遗忘的作品。

也真怪，世上不少人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被人遗忘！

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点燃了人们的聪明，从公园的角落里被抬了出来，重新安置在一个光耀的位置上。

罗丹一定见过中国人做过的达摩像。巴尔扎克披着晨衣的姿势和神气太像达摩。他赋予那点精神，比巴尔扎克还要巴尔扎克之极！

应该细细揣摩罗丹对付泥巴的技巧。捏一团泥巴往嘴上一按就是胡子，就是眉毛，挖一个深洞形成了额角和深邃的眼睛，多奇妙！多杰出！这个小技巧的展示，为雕塑世界开辟了多大的领域！

波特莱尔告诉罗丹关于塑造巴尔扎克形象时说过：“你在创造一个元素的形象！”

当然如此，在艺术上，罗丹本来就是一个专门发现艺术元素的人。

罗马，最初的黄昏

有几天我们去了罗马，在附近一个小城阿里阿罗看望我儿子十几年前的雕塑老师维吉里奥·莫塔和师母弗兰卡。除了罗马城里有一间祖传的金银手工作坊外，在阿里阿罗他们亲手建设起来这座庄园。

地窖很宽广，是铸造作坊。地面上有麻石铺就的客厅、餐室、工作室和不少卧室。粗大的木楼梯上去是书房兼陈列自己作品的精致套间。

养着一些猫，一只大狗名叫布隆多，毛粗得像麻绳，平日在家里看门，一年几次地跟人上山打野猪。布隆多粗鲁得像李逵，也懂得人的细腻情感。此外还有一些鸡鸭、火鸡、一只其大无比的肉猪；一匹自由放荡、爱唱爱闹、一事不做的毛驴安东尼亚女士。

园子里栽了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树，还有瓜豆蔬菜。

维吉里奥的金属雕刻行当是祖传。祖辈为国王家族制造金银饰品和皇冠，传到维吉里奥·莫塔时，也曾为欧洲剩下的几个小国王做过皇冠，大部分转业为总统、总理服务了。定期做些金银雕塑国家礼品。

要不亲眼看见，你难以相信一个人技巧智慧会达到这种程度。罗马城中所有的巨型纪念塔上的雕塑，他顷刻能用蜡捏造出来，一寸或一尺随心所欲，神气不差毫厘。

我儿子跟了他一年，被他们家里当做亲儿子疼爱，每天做好吃的饭菜，连衣服都不准他自己洗。一年后，儿子去米兰上工业艺术设计学院前夕，他们还哭了一场。

这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往事如梦如烟……

这一次我们又去他家住了好几天，见到许多新老朋友，纯意大利式的生活和交情。热烈真挚，白天晚上，有如过年。友朋的相处的温暖，最接近“感激”的心情和诗意了！

有一天维吉里奥·莫塔说要开车带我、他太太的弟弟和我的儿子黑蛮去一个地方。我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个什么地方，儿子的脾气是不狠狠砸他一锤子是不说话的，于是信着莫塔在坑坑洼洼里、山沟里乱窜，心里揣度目的地不会有太多的文明可看了，……或是，他要为我实践打野猪的诺言？

行行重行行，我瞌睡反复，停在一个野气十足的山下，下车上山。一个钟头或是两个钟头，来到一批古旧得像火山熔岩凝固的、败落到底的房屋群面前。

几百年大树夺门而入再穿窗而出，缭绕回环，四围安静如水，景象森穆庄严。原来罗马前文化时期的遗址，算算一两千年了。居然还有高与树齐的石建人工水渠。半圆形的斗拱顶着一条巨大的管道。作为罗马人的子孙，是意大利人的骄傲，作为人类的子孙，我们大家都有份的骄傲。

写这篇文章时我见了鬼，把这座山的名字忘了。

再走上去，一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住屋和教堂，也都坍塌得不三不四。高山平坡上，残阳夕照下一座教堂，屋顶也没有了，还说是文艺复兴晚期的贝利尼设计的。贝利尼这家伙好了得，是《阿波罗和达菲利姬》那座著名雕塑的作者。

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坡上盖那么大的教堂干什么？谁来做礼拜？神父岂不落寞不堪？也可能当时住过很多人，因为战争、鼠疫之类的不幸，人都失落了……

匆忙地摆起画架，用短跑家的速度，画了一张画，取了个《罗马，最初的黄昏》这个题目。题目是我心灵的感应，画的是几百年前的教堂，心里想的是罗马前期文化。说切题也可以，说不切题也可以，是我自己的事。

写到这里，记起这地区了，它名叫依特鲁斯坎，属于拉香省管辖。

画完画，大家一齐回家。疲乏，没什么值得说的。

在那座山上坐着画画的时候，想起我在北京的一些日子。时常和家人或是朋友到十三陵那些没有人理睬的废陵去玩。

我们自己开车，把车子停在废陵的门口，搬出茶具和毡子席子，锁上车门，一直走进杳无人迹的陵院里去。

数代豪华，隐没在荒草颓垣、乱鸦斜日里。松柏肃杀，牌坊和石雕的祭坛供桌，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都令我记得在跟当年的皇上聊天神会的感觉。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

我常去的有康陵、泰陵、宪陵……这都是只有放羊人才去的地方。

好朋友到访，不管男女，都要开车陪他们到那儿去坐坐，喝杯茶。其中有些朋友深沉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品味；另一些朋友事后告诉别的朋友：“黄永玉开车带我们上那种地方去，断墙断瓦，坐没个坐处，铺张席子在地上，还兴致盎然地请人喝茶，那种地方，谁还喝得下茶去？无聊！”

唉！朋友跟朋友可不一样。

记得解放初期，某位大诗人仗着跟毛泽东主席的几十年友谊，要毛把颐和园偌大的地方送给他。毛纵然是国家主席也免不了吓一大跳，这哪里送得起呢？也显得这位诗人十分天真，毕竟是个只会做诗的诗人。

《北史》《景穆十二王传》说：“任城王澄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那时“公园”怕也只是“官地”，没有把现在的“公园”一块块分给穷老百姓的意思。要真分了，岂不闹得天翻地覆？反过来一想，一个诗人要颐和园这么大的地方干吗？他管得了、住得下、养得起吗？

真正的公园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培根有一篇《论花园》的文章，说的是花园设计，和我现在的想法关系不大。“乐游苑”，算不算比较早的地方呢？汉宣帝的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起“乐游苑”，那地方在长安南边最高的地方，可以欣赏城里的街道景致，原来既然叫做“乐游苑”，大概应属于“御花园”的范围。八百多年后唐朝的李白的词里已经是“乐游原上清秋节”，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老百姓搞“晨运”、“烧烤”的天然公园了。

鄙人70年代初劳改下放三年，最初一年多在河北磁县，劳动于十几里的临漳河一带。提起这条河可是大大有名。战国时代的魏国人西门豹的《河伯娶妇》故事就是在这里演出的。曹魏的阿瞒先生在这里练过水军；既淹得死良家妇女和巫婆，又练得了强大的水军，应该算得汤而汪之的大河了，不然，两千多年后的漳河水深已不过膝，鄙人那时官居“草药组长”，随便拉着满载“旋覆”黄花的双轮板车涉水过河已十分轻松。《西门豹治邺》的这座“邺城”，变成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除了小学教员之外，谁也不清楚自己这块土地上发生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铜雀台”也在村子外头西北另一个更小的村子边上。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漳河边盖了座“铜雀台”，三年之后加了一座“金虎台”，后来又弄了座“冰井台”，一共在三个山上接连盖了三座宫殿。养了千百个宫妃侍女和招待来宾的“文工团”，可以想像其规模和气派之伟大。眼前呢！只剩下二十来公尺高的一个半土墩子，土墩子上有座极勉强的小学，坡下一

座后来不知什么时代留下的坍塌的庙门和半截老树。庙门洞左侧地面竖躺着一段两公尺左右的青石龙头雕刻，远不过明代，算是颇为式微的艺术文物了。

眼前这样的面目和架式，别说“铜雀春深锁二乔”，我看连坡上的两三个小学村童也都“锁”不住的。

惟一留下的纪念是这可怜可悯的小村子的名字还叫做“三台”。

这里要成为“公园”或旅游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都灰飞烟灭，彻底完蛋，“以给无业”也没有人要。

这就让我想起要有资格成为今天的“公园”，还得具备一定的条件。

漳河没有了，铜雀台没有了，连“规恢三百余里，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的阿房宫都没有了。变成农田，变成荒地，自自然然。“楚王台榭空山丘”！一点也不奇怪。

圆明园，英法联军烧剩了几根石头柱子。烧剩几根柱子也好；总比“大炼钢铁”时期烧得“一根鸡毛也不剩”（河北农民评语）好得多。

鄙人倒是双手拥护赞成做皇帝、做总统、做第一把手的多盖宫殿别墅，楼、堂、馆、所，要多讲究就怎么讲究，要多阔气就怎么阔气；贯彻再接再厉，前赴后继，一往直前，奋不顾身的精神，踏踏实实，不怕倾家荡产地做下去。这有个好处；既照顾了皇帝、总统和第一把手的“眼前利益”，也庇荫了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这批建筑迟早会变成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回到人民手中”。

欧洲、亚洲、中东，这样的正反例子多的是。希腊、罗马，皇帝、将军大打其仗，总是遵守着一定的“比赛规则”：“杀人，不毁物”。人死了成为古人，却留下了搬不走的東西。财不尽，民再穷也还翻得了身。

连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也鼓着一肚子气在首都马尼拉盖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有益社会的公共建筑和文化殿堂。

最混蛋的是那个埃及的末代皇帝法鲁克和越南的保大。百分之百的头号“二世祖”，超级花花公子，狂嫖滥赌，到处玩乐，无恶不作，花光祖业完事……

（法鲁克虽然是个混蛋，他倒是说过一段颇有预见性的行话：再过几十年，世界最后只剩下一个皇帝，那就是桥牌中的“老K”！）

世上没有梅蒂奇，没有慈禧和她上几代“先帝爷”，没有路易王朝，没有沙皇……我们会少多少公园和游览胜地？

我始终弄不清公园的来历。比如说，像找纯种狗一样，弄一两座跟封建王朝毫不挂连的纯种公园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不是公园，却硬说是公园的事我倒知道不少，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听。不说了！

